

民国新闻史专题研究

# 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对象、目标、功能及态度诸问题

倪延年\*

〔摘要〕 自2007年以来,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民国新闻史研究有了迅速发展。本文在对“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目标、功能和态度进行初步探索和思考后,提出了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新闻事业构成要素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并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加以认识,民国新闻史的研究目标是再现历史和探寻规律,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社会功能是评价历史和借鉴当下,以及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应是历史和辩证的态度等观点。

〔关键词〕 新闻史理论研究;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国新闻史观研究

民国时期新闻史(简称“民国新闻史”)是特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漫长历程中的“中华民国”这一历史阶段的新闻史,是“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时期(1912—1949)的中国断代新闻史。“民国新闻史学”则是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形成的一门专门学科,是一门介于“中国新闻史学”和“中华民国史学”之间的下位类学科。本文拟探讨“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社会功能及研究态度等基本问题。

## 一、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

方汉奇先生指出,新闻史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类报刊、一类报人,乃至具体到某一家报刊、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次宣传战役的历史。研究到近代以来的新闻史的时候,则还要兼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现代化新闻传播机构和手段的历史。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先后涌现过6万多种报刊、1000多个通讯社、200多个电视台和成千上万的新闻工作者,有过几百次大小不等的有影响的宣传战役。这些都是中国新闻史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sup>①</sup>在方先生这一经典论述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民国新闻史是研究民

\*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13&ZD15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13AXW003)阶段性成果。

①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新闻纵横》1985年第3期。

国时期新闻事业(新闻媒介、新闻业者、新闻活动)产生、发展、变化历程及其内在规律的学科。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新闻事业及直接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系统,主体是民国新闻事业。作为“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主体的“民国新闻事业”则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层次予以认识和阐释。

### **(一) 宏观研究对象:整体的民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

“宏观研究对象”是指对“民国新闻史”从集体的、系统的、机构的、合成的或团体的层次进行研究的客观对象,在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整体结构中居于体系结构的顶层。从宏观角度对“民国新闻史”的研究也就是把“民国新闻史”作为一个整体的事物进行综合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如对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及标志的研究;民国时期新闻事业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的研究;民国时期新闻事业发展变化与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社会因素互动变化关系的研究;民国时期新闻事业体系内部结构变化规律的研究,民国时期新闻事业各组成要素(新闻通讯社、新闻报纸、新闻广播、新闻杂志、新闻纪录电影等)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发展阶段划分标准的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方法的研究、民国新闻史在中国新闻史上特点和地位的研究等等。

### **(二) 中观研究对象:类群的民国新闻事业要素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

在民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体系结构中,中观研究对象介于宏观研究对象和微观研究对象之间,一般是构成“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要素类群。民国时期新闻事业是由这一历史阶段的新闻媒介、新闻工作者、新闻活动等多种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不同类别(群体)要素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就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中观研究对象。具体如对民国时期的新闻通讯业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广播业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业研究;民国时期的军事新闻业研究;民国时期的外国在华新闻业研究;民国时期的图像新闻业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报业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电影业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学术研究的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业者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外新闻交流研究;民国时的新闻技术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管理体制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业务研究等。这一类研究的基本特征是对某一类或某一次类(如“新闻广播业”中的官办广播业或民办广播业;国人广播业或外国在华广播业)的整体性研究。

### **(三) 微观研究对象:个案的民国新闻事业要素发展历程及其个体特征**

构成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各种要素(新闻媒介、新闻业者、新闻活动)都是由诸多具体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体。“民国时期的新闻媒介”包括民国时期的新闻报纸、新闻杂志、新闻广播、新闻通讯社、新闻电影等具体新闻媒介类群。其中每一个“新闻媒介”类群中又是以具体新闻媒介个体(具有特定主办宗旨、社会组织形态、社会活动内容及社会活动效果的个体新闻媒介如报纸、杂志、新闻纪录片或新闻媒介组织如新闻通讯社、新闻广播电台)形式存在。如“新闻报纸”这一类新闻媒介就是由诸如新记《大公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群众》周刊、上海著名商业大报《申报》和《新闻报》、成舍我创办的小型报《民生报》等数以千计的新闻报纸个体组成的。

上述三个层次的研究对象,从顶层往底层研究的思维逻辑是从“民国新闻事业”宏观角度把握整体性质,到“民国新闻事业构成要素”中观角度认识某一要素类群的群体特征,再到个体内部(微观)辨别各自特点;而从底层往顶层研究的思维逻辑则是先从“民国新闻事业构成要素”的个体解剖“麻雀”认识特定个体的个性化特点,个体研究积累多了就比较容易概括出个体所在类群的特征;在综合类群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再现民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进程并总结归纳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 二、民国新闻史的研究目标

研究民国新闻史的目标是什么？这似乎是难以解答同时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所有研究只有能解决问题才有意义和价值。民国新闻史研究应该是尽可能“再现”民国时期新闻事业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真实历史，“探寻”民国新闻史中蕴含并对当今具有借鉴或指导价值的客观规律。

### （一）再现历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目标

再现历史是指将民国时期新闻史上客观存在过的社会环境、新闻媒介、新闻人物、新闻活动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历史事实”，通过今人对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发掘的原始史料及前人研究成果的搜集、排列、组合、呈现，让当时曾经出现过的历史现象“再次展现”在今天研究成果中，尽可能还本来的历史面目，使今人能从当时的“历史真实”中感受、认识和理解“真实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0年11月7日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sup>①</sup>打出“共产党”旗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新闻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史，甚至在一些阶段处于几乎难以继的困难状态。江西中央根据地创办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等一大批红色报刊在红军长征后大部分被迫停刊。红军长征途中坚持出版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报》是油印小报，每期报纸只印几百份在红军中传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则因占据着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以优越的社会资源开办了大批“党化”新闻媒介，宣传蒋介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独裁理论。一些民营报纸在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和经济诱导下，不得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态度。这应该比较接近蒋介石国民政府前期新闻业的实际情况。但在建国初期的特殊社会环境里，加上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叙述“民国时期”新闻业时，对共产党新闻事业在发行规模、社会影响以及所用文字篇幅等方面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拔高”现象，对当时实际处于强势地位的国民党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则采用相对“淡化”乃至视而不见的态度。如上世纪50年代以中央党校新闻班为基础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部分教员共同编写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从题目看似应涵盖“中国现代”（1919—1949）这一阶段的所有“中国报刊”，但讲义内容则是“着重介绍和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建国以前的近30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历史”。很显然，这一“着重”不仅与书名不相一致，也与当时实际情况不尽相符，与学术研究的“客观真实”基本要求也有差距。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大量真实、可靠、全面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和独立辨析思考，才有可能“再现”接近“历史真实”的图景。

“再现历史”不同于“重构历史”。“重构历史”是“重新构建一个历史”。但构成历史内涵的要素（历史的人物、事件、媒介、活动等）实际已经固化为“历史”遗存，建立了历史存在大厦。“重构历史”就意味着把原本已存在的按照客观时间次序构建的“历史存在”大厦，先解构成一个个可以重新组合的“部件”，再按照“重建者”设计意图把“历史存在”的部件“重新组合”成为一座新的“历史存在”大厦——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至少在历史进程的时间次第顺序角度是不可能逆转或重组的。

“再现历史”不同于“颠覆历史”。“颠覆”历史是要“颠覆”前人或今人对民国时期新闻界发生的历史事件、从事新闻活动的新闻业者和新闻媒介个体的历史评价。尽管从时间、阶级、政党、集团利益的角度，对民国时期新闻界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新闻活动的新闻业者及民国时期的新闻媒介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是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阶级、什么政党或集团的评价标准中，那些卖国求荣的新闻

<sup>①</sup>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共产党〉》第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媒介、新闻业者及新闻活动都不会有“正面”的评价,否则必然受到民心民意的唾弃——所以今人是不可能彻底“颠覆”历史的。

“再现历史”也不等于“还原历史”。“还原”是通过后人努力“还原原来”的历史。由于史料埋没、时人亡去、社会变迁、文献失传等多种原因,后人很难完全“还原”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历史学者心里的“历史”,是他们借助历史事件、人物和活动表达自己历史选择观的载体,不是完全照片式的“还原历史”。而“再现”则是借助于真实、完整、系统、全面的史料和研究者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把本已存在过的历史图景“再现”出来。“再现”是研究者主观的行为,“再现”结果的真实可信和全面客观程度受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学养积累及思辨分析研究能力制约;“再现”可以是宏观的整体的“再现”,也可以是特定角度、侧面的“再现”。

## (二) 探寻规律: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境界目标

探寻规律是指在对民国时期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新闻媒介的变迁、新闻业者的沉浮、新闻活动的发展、新闻内容的衍变及新闻技术的进步等进行研究、思考、分析、综合、升华和提炼后,从“众多”“零碎”并似乎“随机”的历史片段中发现其内在必然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以科学语言形成别人可以理解、解释、验证甚至再现(重复)的规律性表述的过程。“规律是事物间的必然关系”。民国时期新闻史的历史现象中蕴含着丰富的、错综复杂且多变的关系,诸如民国新闻业和民国社会政治的相互关系,民国社会发展与民国时期新闻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民国时期新闻业者与新闻媒介、新闻活动及新闻活动发展的相互关系;民间新闻业与官方新闻业的相互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新兴新闻媒介的关系;社会意识形态与新闻活动氛围的互动关系;民意民心与新闻业兴衰的互动关系等。这些“关系”揭示的就是民国时期新闻史中客观蕴含的“规律性”东西。作为客观存在的“规律”,不管在什么社会环境下都“顽强”地发挥作用,推动或制约着新闻事业发展及和社会的互动。

合法媒体与政府之间以一种什么样状态共存于社会环境中,这是中外新闻界一直纠结的问题:完全不与政府合作的报纸不被政府喜欢,最后会因失去政府支持保护难以为继;完全与政府合流的报纸不讨读者喜欢,最后会失去读者市场也难以为继;新闻人在处理新闻媒介与政府、与读者关系方面有没有客观规律呢?合法媒介与政府相处有没有基本规律可循?《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探索和实践被称为“合法媒体与政府关系的理想模式”<sup>①</sup>,我们进一步认为“小骂大帮忙”是合法媒体与政府得以共存于同一社会环境的基本规律,也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小骂大帮忙”的基本内涵是:报纸“骂”和“帮”的立足和出发点都是为国家的利益着想,为政府的利益着想;“骂”是为了“帮”,“骂”本身便是“帮”;“骂”得顺畅则“帮”才有力,“骂”得为难则“帮”乏力。<sup>②</sup>也就是说,要成为“合法媒体”就必须遵循“小骂大帮忙”这一基本规律,如果媒体不愿意按照这一规律运作就不可能成为“合法媒体”。这个规律在民国时期是这样,在共和国时期也是这样。分析和认识当今新闻媒介与政府之关系,也需遵循“小骂大帮忙”这一规律。新闻媒介应把自己定位于“政府诤友”的社会角色,保持“文人论政”的淡定心态,以维护国家利益、政府权威、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归宿,与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持适当距离,坚持客观全面真实报道的原则,以“建设性态度”发现并及时严肃批评政府行政过程的不足、失误或缺位,并运用舆论的力量督促其改正,成为维护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再现历史”应该是、必须是或仅仅是“历史”现象的“再现”,是对存在过的场景、事实、经过、次序、活动等“历史存在”的恢复和呈现,只要拥有充分、完整的历史性文献或实物,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sup>①</sup>吴廷俊、阳海洪:《合法媒体与政府关系的理想模式——对“小骂大帮忙”的新解读》,吴廷俊著:《考问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3—444页。

<sup>②</sup>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



的基本方法,“再现历史”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探寻规律”则要从似乎没有联系的两两者或多者事物中“探索”和“寻找”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要在客观、杂乱乃至无序的历史现象“碎片”中探索和寻找规律性东西,就不不但要有“史实”,也要有“史识”,更要有“史德”,还要经历艰难、刻苦、纠结、矛盾、冲撞乃至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解读历史现象中感受规律的作用,通过探索、思考发现规律,在正确世界观指导下以“科学”方法和“准确”语言表述规律,以资后人借鉴。

### 三、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功能

最近在和博士生交谈中,获知他们中一些人担心新闻史(不仅是指民国新闻史)研究能不能长久?焦虑能不能把新闻史作为自己一辈子的研究方向?疑惑民国新闻史研究是否有实际价值?笔者认为,学科研究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研究的价值,取决于其研究成果对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社会功能,而民国新闻史研究至少具有“借鉴当下”和“清晰先人”两方面社会功能。

#### (一) 借鉴当下: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显性功能

借鉴当下是指从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发现、总结、提炼的规律性认识,对“当下”的新闻实践具有直接“借鉴”作用。纵观民国新闻史的数十年间,既有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办报不须申请、新闻不受检查、言论不受约束的大好时光,也有袁世凯政府时期查封异党报刊、扶植亲信报刊、打压商业报刊的“癸丑报灾”;既有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党营”新闻报刊迅速发展、抗战胜利后急剧扩张,到发动全面内战失利后急剧衰退,最后全面败退到小岛台湾的曲折历程;也有共产党报刊在大革命时期蓬勃发展、“四一二政变”后跌落低潮、抗日救亡运动中恢复生机、国共合作抗日得到发展,到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中全面紧缩,又在解放军大踏步反攻中迅速发展的历史过程。

民国新闻史上复杂的历史过程和纷繁的历史现象中蕴含了诸多客观规律,其中一条就是“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是幼小、柔弱的新闻事业,只要顺乎民心民意和社会发展趋势,也能在坚持奋斗中发展壮大;反之即使凭借军队夺得政权,利用行政资源“数量对质量”成为拥有相当体量的“胖子”,那也只是“虚胖”,最终还是难以逃脱被民众抛弃的结果。无论什么时代的新闻人都应懂得“民心所向、民望所归”是新闻业“兴旺发达”的客观规律,“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是任何个人、政党及团体都违抗不了的客观规律。遵循规律,就应强调“人民新闻媒介为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权贵利益服务,就应强调“人民新闻工作者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就应强调新闻活动“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和谐统一”而不是把党性和人民相对立,就应强调新闻言论和自由的权力应用于“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谋财谋权、为“公知”发声、为权贵辩护。“顺民心则强,逆民心必亡”的历史规律,对今天的新闻媒介、新闻人及其新闻活动难道不是启迪和警示吗?

#### (二) 清晰先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功能

清晰先人是指通过充分挖掘历史文献,在客观、真实、全面、系统的历史文献梳理、剔抉、分析、考证中,使民国时期新闻人的形象能够突破、超越或消除以往形成的“模糊感”,还其“本来面目”,实现“先人”形象的真实“清晰”。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民国时期大多数新闻人是在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走过来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必然会对新闻人的生活道路产生复杂的影响。随着社会环境中各种关系的不断变化,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民国时期新闻人也是不断变化的。有些人开始走的是错路后来幡然醒悟改走了正道,也有人开始走的是正路但后来走上了“不归路”。当然也

有不少人一直在人生道路上探索,最终在比较中走向了光明。

尽管这些民国时期新闻人的结局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不是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是天生的共产党人、民主主义新闻战士或汉奸新闻人,而是各自经历了社会思潮认可、人生价值观转移、社会道德观的动摇或坚定等多方面变化或转折的结果。如在民国时期新闻史上绕不过去但一直存在明显争议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先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维新改良和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中共“一大”到“五大”期间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较完整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宣传体制和机制。大革命后期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下遭到失败。“八七会议”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参加中国托派,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获释。出狱后主张发动群众抗日,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在四川江津(今属重庆)以教书为生,直至病逝。就是这么一个“陈独秀”,只因在后期参加托派、创办托派刊物并坚持不认错,所以在相当长时间的新闻史著作中对其前期新闻活动言之甚少并被“模糊化”。不仅文革前编写的《中国现代报刊史》等对“陈独秀”言之不多,就是在改革开放近10年后出版的新闻史著作中也看不到创办《新青年》杂志、《每周评论》等重要报刊及领导出版中共“第一个半公开的政治机关报”《向导》的陈独秀的照片,和《新青年》书影相邻的是时任《晨报》总编辑李大钊的照片<sup>①</sup>,更不要说对陈独秀从创办《安徽俗话报》到领导创办《向导》并构建早期中共新闻宣传体制机制的历史性贡献进行比较客观评价了。我们认为,民国新闻史研究应对陈独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新闻活动性质、功能和社会作用进行有区别的评价,“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一阶段(如中共建党早期对共产党新闻工作体制的探索实践)“是”就说“是”,那一阶段(如参加中国托派并组织托派小集团成为首领)“非”就说“非”,并把新闻活动放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考察,以便让后人了解和认识一个更接近历史真实的“陈独秀”。这应是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追求的历史功能之一。

## 四、研究民国新闻史的学术态度

民国新闻史是民国时期新闻事业各要素产生、发展、变化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历史。由于“民国时期”是由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共产党敌对的蒋介石国民党执政,使得对一些人物、媒介、事件的认识和评价比诸如唐、宋、明、清各朝新闻史研究更为敏感和复杂,因而在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成为“不是禁区的禁区”。为能实现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目标和社会功能,笔者认为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应取“历史的”和“辩证的”学术态度。

### (一) 历史的态度: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态度

历史的态度,一是指应尊重客观的历史存在,即必须立足于民国时期新闻史上客观真实存在过的历史遗存进行研究,二是要把历史的东西放在历史的环境中认识、分析和评价。研究历史的前提是充分地占有资料,不断挖掘资料,认真辨析资料。只要某一问题史料搜集齐全了,史料内容(记载的事件或人物活动)清楚了,此事件(或活动)与彼事件(活动)的关系清晰了,结论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研究者只是起归纳和表述。受限于史料不足,学术界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某一对象的结论不断变化。如新闻史学界对《大公报》的评价就经历了几个反复: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给天津市

<sup>①</sup>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4—95页。

委的指示中明确表示《大公报》“不要让它先出版”，因为它“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组不能出版”<sup>①</sup>。解放后，有著作认为1929年12月28日蒋介石通电全国报馆下了“求言诏”，《大公报》立即著文大加赞赏，“不仅从此对支持蒋（介石）更加起劲了，稍后吴鼎昌还直接参加了国民党政权，使这家标榜‘不党’的报纸终于作为国民党内派系之一——政学系的报纸而成了这个统治的重要支柱。”<sup>②</sup>因在国共内战责任的争论中以“民间的”、“超党派的”面貌为国民党内战政策宣传，被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概括为“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sup>③</sup>的“小骂大帮忙”基本立场，此后新闻史学界在数十年间基本沿用这一定评。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对史料新角度解读，2004年有学者认为“小骂大帮忙”“是长期以来扣在《大公报》头上的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但同样是难以坐实的”。因为“《大公报》对国民党当局，不光是‘小骂’，也有大骂，有时甚至是怒骂和痛骂”，“《大公报》确实也骂过共产党”，“同样是骂，两骂相比，《大公报》骂国民党的时候更多一点，也更经常一些。”“如果说她对中国的某些党派有过所谓的‘帮忙’的话，那么，她更多的是帮了共产党，而不是帮了国民党”，“《大公报》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其特殊的贡献。无论如何，再也不该把‘小骂大帮忙’这个说法强加在她的头上了。”<sup>④</sup>2008年，有学者认为“拿《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来说，小骂属于具体报道，而大帮忙则属于总体态度”，“《大公报》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态度往往比较矛盾，既拥护，又批评。当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拥护，次要方面才是批评。只有这么看问题，才能理解蒋家王朝何以长期容忍《大公报》的存在及批评，蒋介石对《大公报》及其头面人物何以礼遇有加。……张季鸾、王芸生等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批评，更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然他们对这一腐败、独裁的政权也时时进行激烈的抨击，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那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还是愿意维护蒋介石及其政府，还是希望在‘党国’的既定体制内实现他们所谓自由、民主的宪政理想。”<sup>⑤</sup>进入新世纪后，有学者以新开放的“蒋介石档案”（“大溪档案”）为基础且基本上将“蒋档”中与《大公报》及其报人有关的所有材料一网打尽，基本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为基础进行研究<sup>⑥</sup>后认为：“在该报24年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大公报》关注国民党方面的频率要远高于中共；该报对中共的负态度也远高于对国民党；中共阵营中，毛、周、朱等人物都曾被‘骂’，而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却始终幸免；《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批评，多针对具体政策，且多是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对于中共则多次声明反对其意识形态，并一再宣称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至少在1933—1940年，《大公报》与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密切互动，双方就该报言论问题多有探讨，而中共则从未有类似待遇”，因此“所谓‘小骂大帮忙’，在《大公报》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确实存在”。<sup>⑦</sup>完全以史料说话，依据新史料进行新研究，得出新结论是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现象，因此，“历史的态度”应是研究民国新闻史的基本态度。

## （二）辩证的态度：民国新闻史研究的科学态度

辩证的态度，一是指尊重客观的历史存在，二是辩证地认识、评价当时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才能

①《中共中央关于对天津〈大公报〉〈新星报〉〈益世报〉三报处理办法复天津市委电》（1949年1月23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70页。

②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第190页。

③《新华日报》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1945年11月21日。

④方汉奇：《前言：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载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1页。

⑤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9—280页。

⑥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再研究：序一》，载俞凡《新记〈大公报〉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

⑦俞凡：《新记〈大公报〉再研究》，第420—421页。

得出符合历史的研究结论。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稿)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归社会公有”。<sup>①</sup>假如机械地认识和执行这一“纲领”,就会对共产党在成立后到共和国成立前新闻宣传上的一些变化,有时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变化很难理解,这就需要以“辩证的态度”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及其蕴含的内在动因进行认识和分析。

从共产党诞生到共和国成立前的近30年间,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在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特定“语境”下经历了五次明显转折:1922—1924年间的第一次转折,是因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太单薄而不足以独立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国民党是当时最有革命性的政党。1925—1927年的第二次转折,是因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产阶级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1931—1937年的第三次转折,是共产党人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才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促成国共两党抗击日本军国主义。1944—1945年的第四次转折,是为顺应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民主建国”的民心潮流和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尽可能避免内战,所以从被政府“接纳参加抗日”转折为倡导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5—1946年的第五次转折,则是国民党当局悍然召开“一党国大”断送了民主建国的前程并全面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解放军发动进攻。在中共力量无法改变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的“语境”下,共产党只有从积极倡导“联合政府”转向“打倒蒋介石”了。

假如按照僵化的态度看待共产党在“一大纲领”中的宣示,再对照共产党在民国时期新闻宣传的转折,似乎很容易得出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不稳定”、“随风转”的看法,只有以“辩证的”而非“僵化的”态度并把共产党新闻宣传转折这一历史现象放到特定语境下去考察,才能得出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是既“坚持初心”,又顺应环境变化“与时俱进”的结论——事实也正是如此。因此“辩证的态度”应该是研究新闻史的基本态度。

(责任编辑:高峰)

## On the Research Object, Purpose, Function of and the Stance on the Journalistic History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NI Yan-nian

**Abstract:** Since 2007, rapid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on the journalistic history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exploring the research object, purpose, function of and the attitude to the journalistic history in that period, we argue that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and the regularity in their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which can be recognized respectively from macroscopic, intermediate, and microscopic levels. Its research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history and explore the regularity. The main social function of the studies on the then journalistic history i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and evaluate history properly but also to draw from it som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resent. And the basic stance we should adopt to view this history should be guided by historical dialectics.

**Key words:** theory of journalistic history; journalistic history in Republican China; outlook on Chinese journalistic history

---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2),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2年,第49—51页。